

中国近年积极参与的国际救援

11 月 18 日晚,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货机缓缓降落在菲律宾宿务机场,中国政府向“海燕”灾区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紧急救援物资,抵达目的地。加上 19 日上午送到的第二批物资,中国已向菲律宾提供总价值 1000 万元人民币的救援,包括 2000 多顶帐篷和 1 万条毛毯。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数次大灾后的实际行动都表明“中国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报道,除在第一时间向受灾国提供 2163 万美元的物资和现汇外,根据灾情发展,12 月 31 日,中国政府再追加 5 亿元人民币救灾款。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救援

中,中国大陆的民间捐款到账资金,累计高达 6.1 亿人民币,开创了民间捐助的新纪录。

此后,中国还首次对发达国家提供了灾害救援。

2005 年 8 月 29 日,美国新奥尔良市附近遭遇飓风。灾难发生后 5 天,中国政府宣布向灾区提供 500 万美元救灾款。9 月 8 日,中国还将援助美国灾区的 104 吨紧急救灾物资送达美国空军基地。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大地震。次日,中国商务部就正式启动援助,本着“日方提需求,我方满足”的原则,将 2000 条毛巾被、900 顶帐篷、200 台应急灯等救援物资,分 3 批运往日本。

此外,中国还无偿为日本提供了两万

吨、价值 1.8 亿元人民币的燃油。在外交史上,中国只向朝鲜和蒙古无偿提供过燃油。而在资金援助上,仅中国红十字会一家,就向日本红十字会捐款 2600 万元人民币。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远不止这些。

2005 年 10 月,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中国政府捐助了 2050 万美元的救灾物资;2010 年 1 月海地发生 7 级地震,中国政府先后提供约 1 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11 年 7 月,俄罗斯多地发生大型森林火灾,中国提供了 100 万美元现汇和 2000 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

《青年参考》2013.11.20 文 / 高珮蓁 温莎



和平方舟赴菲

和平方舟把一流医院搬到菲

中国外交部证实,将派遣排水量 1.4 万吨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前往菲律宾,并于 11 月 21 日起航。

与先期抵达菲律宾灾区的其他国家的救灾部队相比,和平方舟最大的特点是相当于将中国国内一家一流的医院直接送到灾区。“和平方舟”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海上医疗救护平台,主要担负战时海上伤病员救治和医疗后送,参加国际人道

主义救援、重大灾难应急救援和对外军事交流合作等任务。全球海军中仅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海军有医院船,但美国和俄罗斯的医院船都是集装箱船或者其他船舶改装的,只有中国海军的医院船是专门设计建造的。拥有 300 个床位和 8 个手术室的“和平方舟”号毫不逊色于“乔治·华盛顿”号上拥有 51 个床位的病房。

《环球时报》2013.11.21

田家英的两个敌人

田家英与陈伯达是在延安认识的。当时有一个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田家英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的研究员。陈写了几本书,田曾帮助他搜集了很多材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搜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这件事使田很寒心,对陈的为人也有所认识。

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关系,田家英与陈伯达接触很多,因而比别人更了解他。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褊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田家英早就看出陈伯达的这些品质,说他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田家

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成了陈的一块心病。1955 年,根据毛的提议,重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为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 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乘机向毛泽东“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这纯属诬陷。可惜,毛泽东听信了陈的谰言,并且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这样说了,田受了不白之冤。“文革”伊始,机会已到,陈伯达首先发难,急急忙忙于 5 月 9 日,跑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去点火,鼓动揭发田家英。

田家英另一个危险的敌人是江青。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生活养尊处

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而是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对他落井下石。1962 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

1966 年 5 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受到毛泽东重用,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他当时的心态,表达在头天晚上对夫人董边讲的几句话里:“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田家英

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在他留下的遗言中,最后的两句话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时隔不到 15 年,陈伯达、江青一伙,终于得到他们应得的“恶报”,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摘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文 / 董边 谭德山 曾自

11 月 15 日,韩国统一部批准了韩国现代峨山公司的访朝申请。为纪念金刚山旅游启动 15 周年,现代峨山公司拟派遣专务金永炫等 20 名公司领导人员和员工于 18 日访问金刚山。

近年朝韩关系紧张,双方民间交流渠道基本关闭。而现代峨山公司之所以能在韩朝交流中享有这样特殊的地位,是因为该公司在 15 年前推动落实“阳光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8 年 2 月,金大中出任韩国总统。他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强调:“南北关系要在和解、合作还有稳定和平的基础上发展。”此话表明韩国政府并不急于实现南北统一,而是更加务实地想首先结束与朝鲜的冷战对抗,转而进行和解合作,在相对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下,再逐步实现南北统一。“阳光政策”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而产生的。

在政治方面,金大中积极履行 1991 年朝韩签署的基础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承诺互相和解、互不侵犯,并进行交流与合作。

经济方面,金大中政府鼓励发展朝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朝鲜遭遇粮食短缺的困难,韩国政府不仅积极给予人道主义援助,而且还通过发展农业和经济合作,希望帮助朝鲜找到根本解决粮食短缺的方

两个男人力推“阳光政策” 昙花一现的朝韩和解

法。韩国还承担了轻水反应堆的建设义务,帮助朝鲜解决能源问题。

南北交流方面,金大中政府则优先考虑解决离散家属问题。

面对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同时为改善经济和国际处境,朝鲜方面也做出一定转变。1998 年 11 月,朝方决定开放金刚山旅游,并就此与韩方举行谈判。开城工业园的建设也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外交方面,朝鲜先后与 13 个欧盟国家建交,大大拓展了国际空间。

2000 年,“阳光政策”迎来高潮。当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金大中访问朝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谈,实现了朝鲜半岛分裂 55 年后的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双方会晤后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承诺为实现半岛统一和开展各领域合作和交流而努力。朝韩关系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在推动“阳光政策”实施、促进南北关系发展方面,有两个人是不能不提的。一个是金大中;另一个人是韩国现代集团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郑周永。

就在朝鲜刚刚决定开放金刚山项目不久,很多人还在怀疑这个项目可行性的时

候,郑周永于 1998 年 10 月底率领现代集团代表团访问朝鲜,并很快与朝方达成多项合作协议。金刚山旅游项目由现代集团下属的现代峨山公司负责运营。据该公司宣布,至 2005 年 6 月 7 日止,到金刚山旅游的游客人数突破了 100 万人次大关,月均超过 2 万人次。

2001 年 3 月 21 日,86 岁的郑周永去世,领导现代集团的重担落在了其子郑梦宪身上。不料,两年后的 2003 年 8 月 4 日,郑梦宪跳楼自杀。有分析称,在经历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现代集团实力大损,全力推行“阳光政策”可以说既是郑周永的个人意愿,也是为了集团发展一搏。作为韩朝经济合作两大支柱的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区都是依靠现代集团维持的,现代集团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后,韩国国内又曝出现代集团在配合“阳光政策”时有贿赂行为。陷入财务和政治双重丑闻应该是郑梦宪自杀的主要原因。

郑梦宪死后,韩国政府的“阳光政策”也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支撑,最终在 2008 年李明博出任总统后被放弃。当年 7 月 11 日,一名韩国女游客在金刚山旅游时因进入军事禁区被朝方射杀,作为“阳光政策”标志性成果的金刚山旅游项目被迫中断。

《世界新闻报》2013.11.19 文 / 曹岳

美侦察中国核武内幕

随着大批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被解密,从解密档案中可知:冷战年代,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核武器计划等进行了大量的评估,这些评估也成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

对中国核武计划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 1956 年 1 月 5 日,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中就已提及:“当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拥有核武器,它仅有最初的核研究能力。但是如果苏联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技术人员,中共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1960 年 12 月,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第一台中国制造的反应堆大概在 1961 年末会达到临界状态;第一个钚反应堆有可能在 1962 年末建成。”以此为基础,美国情报部门预测: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的时间,最大可能是在 1963 年。不过,他们认为上述预测是否准确,取决于苏联援助的程度。

由于中苏交恶,1960 年 7 月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由此,美国情报部门判定,中国核能计划将极大受阻。

美国情报部门严重误判

美国情报部门判断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进程是从分析核装料开始的。

一般来说,制造原子弹可用两种核装料进行核爆炸:一种方法是通过浓缩铀,提高铀同位素铀—235 对铀—238 的比重;另一种方法是用二氧化碳铀作为钚生产反应堆的燃料生产钚。从技术上讲,制取钚要比制取高浓缩铀—235 容易些,美国 and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使用的是钚。因此,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会选择钚作为核装料。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仍旧认为钚是中国核武器的首选材料。

事实上,苏联撤走专家确实给中国核计划带来巨大的影响。早在 1958 年底,由于中国还不具备生产裂变材料的技术基础,也不知道应该设计哪种原子弹,不得不以很高的附加条件为代价,从苏联购买设备,同时建设两条生产线:一条是铀—235 生产线,即通过生产铀浓缩获得高浓缩铀作为装料;另一条是钚生产线,即通过生产反应堆获得钚—239 作为装料。

苏联停止援建时,铀—235 生产线的主要环节——兰州铀浓缩厂已基本建成,设备也比较齐全配套;而钚生产线中的主要环节——生产反应堆工程,则只完成了堆奉体的地基开挖和混凝土底板的浇注,后处理厂的工艺线路还有待确定。

因此,中国为了争取时间,及早获得制造核武器铀装料,1960 年 4 月决定把铀—235 生产线作为“一线”工程,即作为重点工程全力突击抢建。而钚生产线则被列为“二线”,暂停建设。直到中国核试验的前一年,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装料的选择上仍然十分头疼。仍然认为钚—239 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首选装料。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国防时报》2013.10.30 文 / 申欣旺